

春秋战国散文选析



I262.31

1

春秋战国散文选析

赵可璧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春秋战国散文选析

赵可璧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876印张 150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10099·1458

定价0.66元

序 言

春秋战国散文，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文艺百花园中和诗歌同时绽放的一朵奇葩。它不仅在当时可以和早于它产生的《诗经》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楚辞》相媲美，而且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了近、现代，也仍葆其青春的活力，哺育着我们的年轻一代。因此，“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素养、服务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无疑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一

春秋战国散文这朵奇葩，是植根于春秋战国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的。要了解春秋战国散文何以产生，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必须先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七二二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大变动的主要标志是经过长期而剧烈的兼并战争，封建制彻底战胜了奴隶制，郡县制基本上取代了分封制，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统一。这个大变动，是生产力的提高，造成土地关系变动的必然结果。

春秋中叶以后，已经开始使用生铁铸造的农具。管子说，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斲，试诸土壤。”（《国语·齐语》）到了战国，铁的应用更加广泛。农业、手工业工具都可用铁制造。由于铁制的耜、铧、镰、耨、铎等农具，有利于深耕、开荒、凿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又由于铁制的斧、锯、钻、凿、刀、锥和针等手工工具的使用，也加速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商业活动。各国的首都，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韩都宜阳、秦都咸阳、楚都郢郢，不仅是各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各国的商业中心。拿齐国的临淄来说吧，当时已发展成为拥有众多人口的繁华富庶的大城市：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击毂，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高度发展的情况了。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一系列的变革。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商业的繁荣，涌现出一批大商人。由于当时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有些积钱累万的商人，购买土地，变成了地主；也有些商人，利用他们雄厚的财力，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爬上了政治舞台（如吕不韦、嫪毐等）。而各诸侯国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已经夺得的政治地位，谋求霸权，并增强自

身的防御能力，从战国初期开始，便进行政治改革，魏用李悝，楚用吴起，秦用商鞅，实行变法革新。其中以商鞅变法成就最大。变法革新，强化了封建统治，但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以争夺土地为目标的兼并战争。所以在春秋时期，除东周以外的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已经兼平成十几个国家，其中以晋、楚、齐、秦、吴、越等六国为最强。以晋楚两国在宋召开的弭兵大会为界，会盟以前，主要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吴越争霸，吴亡越胜，燕始弱小，后用乐毅，败齐，确定了北方的疆界；会盟以后，主要是诸侯国内大夫之间（如晋国六卿）的剧烈兼并。公元前四〇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是为战国的开始。一时间形成了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并峙的局面。韩非说：“上下一日百战。”（《扬权》）可以想见当时的兼并战争何等剧烈了。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残酷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梁惠王下》），或改营商业，或充当雇农，或流入手工业，或沦为奴隶，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终于导致了不久以后爆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一部分人有条件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因而扩大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士”这个阶层。而各国统治者，为了适应军事和外交斗争的需要，便不惜血本地网罗人才，供他们驱使，因而养士之风盛极一时。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号称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士闻名的。士的成分很复杂，有的人是学士（如孔丘、墨翟等），有的人是策士（如张仪、苏秦等），有的人是侠士（如荆轲等），也有的人是武士，而以前

两种人对社会的影响最大。这些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有的代表没落贵族，有的代表新兴地主，也有的倾向于平民。他们面对当时社会现实提出的种种问题，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纷纷著书立说，或论述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互相攻讦和辩难，或阐明各自的政治主张，即“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汉书·艺文志》），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猎取高官厚禄。这样，诸子散文便应运而生了。

和诸子散文蓬勃兴起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发展起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宋代理学家朱熹也同意这种观点，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以寓王法”，“以讨乱贼”。可见孔子的《春秋》，是在先王之道“熄”的情况下，为了在东方复兴周道，为了维护业已分崩离析的周王朝的一统天下而作的。继《春秋》之后，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是传《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也是解说《春秋》的，大都是为了行先王之道这个目的。刘向在他辑录的《战国策》叙录中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战国策》的定名，也正好说明了它的写作目的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综上所述可知，正是无数奴隶和农民的血汗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灌溉和滋养出春秋战国散文这朵奇葩的。

二

上面，我们对春秋战国散文产生的社会背景作了粗略的回

顾，下面我们先从思想内容方面说一说春秋战国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先说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包含甚广，重要的有《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他们的散文，从思想主张方面看，可以分为儒、墨、道、法四大派别。

《论语》的作者孔丘，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哲学思想上，他相信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在政治思想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他反对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因为那样会导致社会上出现“不均”、“不安”的现象，这对“有国有家者”是危险的。他要求统治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又说：“修己以安姓，尧舜其犹病诸！”他这些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利民的，但又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即复尧舜之道），不合时宜。因此他周游列国，却无人理睬，被长沮桀溺讥为“避人之士”。孔丘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但他在文化教育方面却做出了巨大成绩，他的许多论学言论，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孟子》的作者孟轲，是仅次于孔丘的儒家大师，他们的学说，历史合称为孔孟之道。在政治主张方面，孟轲和孔丘是一致的，虽然都有点轻视劳动人民，但他们都主张行“仁政”。他要求“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让老百姓生活上有保障。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希望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且“与民同乐”；而对桀纣之类的暴君则予以无情的

诅咒。对象“齐人”那样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名利的寄生虫给以尖锐的讽刺。他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要严惩那些战争头子；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表现出他对民心向背对于战争的作用的重视。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而他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作为他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论，又是错误的。《荀子》的作者荀卿，虽然是和孟轲齐名的战国时代的大儒，但他和孟子的主张是不同的。在政治上，他批判了孟子“法先王”的复古主张，吸取了商鞅等人的法治理论，提出了“礼”、“法”并用的治国纲领。他认为明君治国大节有三：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王制》）。他把君与民比作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要使“君主安位”，必须使“庶民安政”。他还积极宣传全国统一，主张“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这正体现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哲学上，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明了人事的好坏与天道并无必然联系，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分”的主张。他还认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进一步阐发了人定胜天的光辉的哲学命题。这一切，对于发展唯物主义宇宙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他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虽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他由此出发，说明只有后天的学习才可以使人去恶从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作用，还是正确的。他在《劝学篇》中阐述的关于学习的原则、方法与步骤的理论，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统治了我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便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创造出来的。

儒墨两家在战国时代并称显学。淮南子说，墨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一个反儒的独立学派，墨翟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墨子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他这些主张，虽然有一些和儒家相近（如尊天、事鬼），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对统治者任意压迫和剥削老百姓，要求人类平等，对人民群众是更加有利的。在他这些主张中，都贯穿着一条“兼爱”的原则，所以“兼爱”与“非攻”，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根本的。所谓“兼爱”，就是“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非攻上》）。在《公输》中，写他听到楚国要攻打宋国，便行十日十夜而至楚，劝阻楚王发动对宋的战争，就是“视人国若其国”的突出事例。所谓“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大为攻国”，使“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非攻中》），是不义之事。在《公输》中，他批评公输盘“义不杀少而杀众”，把楚王攻宋比作有窃疾之人，这都是他非攻主张的具体实施。他这些主张，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终归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某些正当要求，还是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的。由于墨子明确宣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刺疼了封建统治者的神经，为他们所切齿，所以从汉以后，墨家思想便失去了“显学”的位置。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任自然，清静无为，他们揭示矛盾的规律，往往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为了回避和缓和矛盾。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以及《养生主》，是他们以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表现了他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仇恨以及他对现实世界悲观绝望的心情。但这并不是说，在他的作品中，没

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了，不是的。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箢》）又说：“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盗跖》）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此外，他还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而万世不竭。”（《天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养生主》），这些认识都含有某些客观真理。

在战国散文作家中，韩非子与孟子、庄子、荀子齐名，并称为四大家。他的文章，有的论述法治主张，有的阐述老子的思想，有的评论诸子的学说，还有的记述历史传说和寓言故事，内容非常丰富，但他的核心思想是法治。他主张采用法、术、势相结合的办法，强化中央集权，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他认为要树立法的威信，必须“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执法一定要严。他反对因循守旧和拘泥陈规旧俗，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变则备变”，一切政治措施必须符合现实斗争的实际。他这些主张，虽然有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专政的一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至于属于杂家的《吕氏春秋》，虽然也包含某些进步思想，但它的影响不如前四派大，这儿就不说了，下面对历史散文作些分析。

《左传》、《国语》、《战国策》，是春秋和战国的历史实录，分别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情况。作者往往在记叙的过程中，通过对人物的褒贬，表达作者对事件的看法和对人物的评价，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左传》的《曹刿论战》和《秦晋殽之战》，通过齐鲁长勺之战和秦晋殽之战的记叙，前者赞扬了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军事才能的曹刿，表达了作者重视民心向背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作用的

主张；后者，一分为二地评价了秦穆公的贪暴和自咎，既写了他的必败，也寓含了秦穆公足以称霸的原因。而在对鲁庄公、晋襄公和秦穆公的贬中，除了表达作者对事件的看法外，还暴露了各国统治者，或眼光短浅，或昏庸无能，或贪婪骄横，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再如《国语·勾践灭吴》，通过对越灭吴的曲折故事的记叙，赞扬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批判了吴王夫差骄傲自大，听不进忠言的错误，并在褒贬之中，总结了越胜吴败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作者对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精神的肯定。《战国策》的《唐雎不辱使命》、《荆轲刺秦王》，歌颂了抗暴的精神；《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冯谖客孟尝君》，都表达了作者重民的思想；《苏秦以连横说秦》，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战国时期秦与六国的连横和合纵的斗争，无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

总之，象郑振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在散文方面，作家“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或为哲学家，或为政治家，或为辩士，或为历史家，或为专门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持。他们是抒他自己的意见而无避讳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与意见的束缚，他们各欲为开山祖，也各有他们的门徒。这个时代，论者每以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就其思想成就来说，在当时的世界各国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三

春秋战国散文的作者虽然并不以文学为专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道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粹粹，

却为汉以后散文作家所少见……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仅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出处同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行动，刻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写了众多的帝王、忠臣、奸臣、谋士和一般人物。帝王如鲁庄公、越王勾践、吴王夫差、郑文公、秦穆公、晋襄公、齐景公、楚王、齐威王、赵太后、秦始皇等，忠臣如曹刿、冯谖、烛之武、蹇叔、先轸、祁奚、文种、范蠡、邹忌、触龙等；谋士如苏秦、唐雎、荆轲等；奸臣如太宰嚭；一般人物如王孙满、秦武阳等。诸子散文中的历史人物和寓言人物如梁惠王、蔡桓公、良人、曹商、遗男和小儿等。这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在同类人物中不仅有共性，同时也有其鲜明的个性。这鲜明的个性，往往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刻划出来的。如《秦晋殽之战》的秦穆公和《荆轲刺秦王》中的秦始皇，都贪婪骄横。秦穆公的贪婪骄横，是由其派师袭郑和派人咒骂蹇叔表现出来的。

“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这一极富个性的语言，再加上“公使谓之”的行动，只此寥寥两笔，秦穆公的贪婪骄横，就如明镜照物，毕露无遗了。而秦始皇的贪婪骄横，集中表现在其听了宠臣蒙嘉的“谨斩樊於期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等话后，“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上，也集中表现在当群臣因“秦武阳色变振恐”而怪之时，而秦王却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中。从“喜”、“服”、“设”、“见”这一系列的行动和秦王的一句话中，足见秦始皇对燕督亢的垂涎已久，急不可待了。但是秦穆公的贪婪骄

横之外，还有引咎自责的一面，而这正是由如下的个性化的言行表现出来的：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这与秦始皇的“目眩良久”和“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轲也”之言，成何等鲜明的对比啊！只此富于个性特征的一言一行，秦始皇贪婪骄横之外的色厉内荏，就溢于言表了。

此外象《曹刿论战》中写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和“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使胸有成竹、指挥才能非凡的曹刿和急躁冒进的鲁庄公，适成鲜明的对比；《晏子使楚》中，所有记晏子之言，都显示了晏子善辩、不辱使命的特点。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春秋战国散文对幼儿少年形象的描绘刻划，是不可多得之笔。写“遗男”，只用了“始龀，跳往助之”六个字，就把幼儿的天真无邪刻划出来了；《两小儿辩日》中的“两小儿”的对话争辩和对“博学”的孔子的那一“笑”，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那长于观察、敏于思考的幼儿的可爱形象便活龙活现了；《秦晋殽之战》用了“观”和“言”写王孙满，就足见其思路敏捷、见解非凡了；《荆轲刺秦王》写秦武阳，虽然他曾“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当他“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时，竟“色变振恐”，后经荆轲的宽慰“顾笑”，竟也能巧于应付这复杂而严峻的局面了，入情入理地刻划了少年之勇。

至于被鞭笞的人物，如曹商与良人，都有利禄之徒的共

性，但其不同的个性，是通过一在官场、一在坟地的言行表现出来的。请看庄子对曹商的鞭笞：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这符合庄子个性特征的语言，就把庄子鄙视功名富贵、从而对富贵利达之徒曹商的鞭笞，都表现出来了。真不知作者的刀笔，何以如此锋利尖削！

（二）善于通过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场面描写刻划人物，尤其善于写战争。

在《秦晋殽之战》中，晋国俘虏了秦国的孟明等三帅，晋襄公听信了文嬴的话，把他们释放回国，先轸闻知，怒火冲天，认为这是“隳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表现了先轸的深谋远虑，而“不顾而唾”这个细节，则表现了其性情的暴烈和盛怒。《齐人有一妻一妾》，立意于以小见大，全文几乎都做了细节的真实描写：从开始的“其良人出，则必饾酒肉而后反”，到末了妻妾讪骂相泣和良人的“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以中间的一段最为细致而真切：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屨足之道也。

这一细节的描写，把良人低劣下流的品行形象化了，令人作

呕，无情地鞭挞了一般黑夜乞怜、白昼骄人的利禄之徒，同时也形象化地表现了其妻的聪敏细心。其他象《荆轲刺秦王》中，“荆轲顾笑武阳”；《公输》中，“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朝服衣冠，窥镜而自视”等等，都是用寥寥几笔写一个人物顷刻间的活动，人物的精神面貌便表现了出来。因此，细节描写，是作者刻划人物的工笔！

肖像描写，出现不多，就所选而言，仅见于《苏秦以连横说秦》和《邹忌讽齐王纳谏》诸篇，以对苏秦的肖像描写为最：

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

这段肖像描写，把苏秦以连横说秦失败而归时的穷困潦倒形象化了，而且由这一形象化的外表，揭示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正是其后苏秦“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的原因。由此看来，肖像描写，也是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之一。

场面描写，在《公输》、《荆轲刺秦王》和《齐桓晋文之事》中，不乏其例。如墨子与公输盘在攻守上的智斗场面描写；孟子所描绘的“发政施仁”和“制民之产”后，将出现的王道荡荡的诱人图景；特别是易水河边送荆轲的慷慨悲壮的场面描写和咸阳宫中刺秦王的激烈搏斗的场面描写，最为突出。这些场面描写，或表现了墨子的近智远谋和勇于实践的精神，同时也剥去了公输盘的“吾义固不杀人”的虚伪面纱，露出了他的青面獠牙；或集中表现了孟子行王道的思想，或表现了荆轲的忘

我勇为和秦始皇骄横贪婪、色厉内荏的性格特点。这些场面描写，往往形成紧张激烈、慷慨悲壮、扣人心弦的典型环境，在故事的发展中形成高潮，人物的性格得以鲜明地突现，产生诱人的艺术魅力。因此，场面描写，也是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段之一。

《国语》擅长记言，《战国策》擅长于记行人辞令，而《左传》尤擅长于写战争。《左传》的写战争，大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注重战争场面和具体经过的描写，如《晋楚城濮之战》的一段：

晋车七百乘，韞韜鞬鞞。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有长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寥寥百余言，描绘的战况却生动如画：先写晋军战前的准备，次写晋楚两军对垒交战。写交战实况，曲折生动，笔力纵横。晋胥臣用虎皮蒙马伪装，击溃楚的右军；狐毛本为上军，却设二主帅旗，伪装退走；栾枝更用战车拖着柴禾扬尘伪装逃遁，以此诱敌深入；名将原轸帅中军横击；狐毛狐偃将左军夹击，击溃了楚的左军。子玉只得帅中军逃走，楚军败绩。这些都是